

区域国别研究

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的跨文化 语言实践与身份重构

唐蕾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的英语写作是一种深具文化自觉的跨语言实践,其本质是在跨文化语境中持续进行的身份重构过程。他们的创作超越了语言工具性的层面,实现了从生存适应到主动创新的身份转变,推动写作语言完成从生存工具向文化武器的范式跃迁。在语言形式层面,作家们通过拼音转写、洋泾浜英语的语音变体与句法异化等策略,系统性地实施语法越界,不仅强化了族裔身份的可辨识度,也更使汉语的语音特征与意合逻辑在英语文本中得以形式化呈现,成为文化记忆存续与主体性建构的重要载体。在文化内容层面,他们对中国文化专有项采取直译、通俗化转译与互文阐释等多元翻译策略,实现了文化符号的直接呈现与根性身份的锚定,唤起深层的文化认同,并通过跨文化关联的挖掘不断丰富族裔身份的内涵。这一作家群体的语言实践已超越简单的语际转换,发展为一种兼具策略性、创造性和抵抗性的文化重构范式。它既是文化抵抗的路径,也是话语权争夺的载体,彰显了作家在全球化语境中重塑文化身份、介入主流话语的主体力量。

关键词: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跨文化语言实践;身份重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6178(2025)05-0012-11

引言

语言实践不仅是文化信息的传递载体,其本身更是身份建构的生成机制。作为跨文化场域中的特殊群体,20 世纪后期移居美国的华人作家(下文称为“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利用他们跨太平洋生存经验,通过英语文学创作深度参与并塑造着主体的身份建构,他们的作品融合跨国族叙事题材与多元文化意识,呈现出较为复杂的跨文化特质。与美国本土出生的华裔作家和移居美国后仍以中文创作的作家相比,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群体的英语

收稿日期:2025-07-27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面向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集群的涉外复合型人才协同培养创新与实践”(202111005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唐蕾,女,扬州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中外语言文化比较与会通。

引用格式:唐蕾. 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的跨文化语言实践与身份重构[J]. 中外交流研究(中英文),2025(5):12-22.

文学实践在创作者身份背景、创作动机、语言风格及文化认同维度均存在显著差异。他们既是中华文化的亲历者,也是传统文脉的传承者。中国本土的成长经历赋予其深厚的文化根基,而移居美国后的文化冲击,促使他们开启“文化重构”与“主体自觉”的探索。这种探索深刻渗透于文学语言中——自幼浸润的汉语思维模式,使其在英语创作的词汇选择、句法结构与修辞策略中会有意或无意保留汉语表达的痕迹。这种独特的语言现象不仅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还使他们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型的鲜明特色。

一、文献综述

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近年来凭借中西文化交融的创作实践在国际文坛大放异彩。哈金的《等待》(*Waiting*)摘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作家;李翊云的《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先后获得了奥康纳短篇小说奖、美国笔会海明威奖、怀丁作家奖、美国卫报的新作家奖,以及加州图书新作奖;裘小龙的《红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入围爱伦·坡推理小说奖,入选纽约《新闻日报》年度十部最佳小说之一,并荣获安东尼处女小说佳作奖,即世界推理小说大奖;闵安琪的《红杜鹃》(*Red Azalea*)不仅获得美国卡里·桑伯文学奖与全美图书最佳新作者奖,更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在全球四十余个国家出版发行。这些创作成就不仅标志着该群体在主流文学界的认可度,更凸显了其作为跨文化书写范式的独特价值。

国内学界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主要聚焦美国出生的华裔作家的英语创作,以及中国出生的新移民作家的华文作品。近年来,具有中国成长背景的新移民作家通过英语进行的文学创作,开始引起学界关注,但相关研究仍较为有限。现有成果主要呈现三个研究维度:一是创作脉络梳理(卫景宜,2014等),二是文化叙事与身份心理分析(唐书哲,2018;唐蕾等,2018等),三是文体形式与翻译诗学的个案研究(余小梅,2024;唐红英,2025等)。现有研究中,对于“跨文化语言实践”作为身份重构核心机制的系统考察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关于美国华人新移民在语言运用与身份塑造之间的群体性、动态性互动研究也较为少见,这为本研究留下了可深入探索的空间。国际学界的研究局限则更为突出。一方面,受语言壁垒、学术惯性及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影响,主流学界将研究重心多放在欧洲裔、北美裔及南美裔文学,华人新移民英语文学常被笼统归入亚裔文学框架,其非母语写作实践与跨文化翻译策略被严重忽视。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多困于族裔研究范式,缺乏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视角,难以解码语言形式与文化身份的复杂关联。即便少数研究涉及华裔文学,也多聚焦于土生土长的美国华裔作家,对其它语言为母语的新移民作家群体的关注仍停留在零散评述、作家访谈等浅表层面。这种研究现状导致两个关键问题被遮蔽:一是双语思

维在文学创作中的转化机制,二是语言选择与身份定位的动态博弈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研究根据国内外影响力、国际获奖成就、作品市场发行量等多维标准,选取哈金、李翊云、裘小龙、闵安琪四位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其跨文化语言实践与文本创作,揭示该作家群体在跨文化语境中创作范式的演进轨迹,以及策略性表达与身份重塑的深层关联。

二、跨文化语境中的创作语言范式转型

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的英语写作,本质上是语言策略运用与身份政治重构的双重实践。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张力场中,他们的创作语言经历了从生存工具到文化武器的范式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体现为语言功能的跃迁,更映射出作家群体在母语文化根脉与目的语权力结构之间,通过语言变异实现身份重构的深层努力。其语言实践早已超越工具性层面,成为后殖民语境下族裔主体性建构的文化行动。

哈金的创作轨迹清晰勾勒出这一转型路径。早期为谋生而写作,英语仅是安身立命的技能,但随着《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提出,其创作动机转向以英语重构中国经验为主。他坦言放弃汉语是一种“语言上的背叛”(Ha, 2008: 31)。这种语言焦虑成为其创作的深层动力。为突破西方对中国叙事的“异域想象”,他选择“在英语边缘地带写作”,通过句法异化与文化专有项直译实现文化抵抗。例如,在《等待》(*Waiting*)中,他坚持历史语汇的直译与“去归化”处理,不仅挑战英语文学的主流叙事规范,更在异质语言中锚定文化根性,使英语写作成为重构身份、争夺文化话语权的实践。

闵安琪的语言转型体现出语言习得与身份重构的深刻互动。初抵美国时英语近乎零基础,八年苦学使其完成从“记单词”到“用英语思考”的蜕变(Mi, 2013: 68)。但真正的转折点是她在遭遇种族歧视后,开始将写作转化为文化反击的武器,在个体叙事中嵌入双重文化解码,试图以文学为媒介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刻板认知(ibid.: 218-219)。在《红杜鹃》(*Red Azalea*)中,她大量使用拼音与洋泾浜英语,并采用短促、重复的简单句式,刻意规避英语的复杂从句结构。这种语法越界并非语言缺陷,而是一种有意识的风格化抵抗,通过制造语言的“不流畅性”,迫使读者直面叙述者在文化错位与身份断裂中的主体挣扎与记忆重构。

裘小龙凭借深厚的双语学术积淀与对西方文学市场的敏锐洞察,构建起极具创新性的跨文化创作范式。作为卞之琳的弟子,其早期在西方印象派诗歌翻译领域已崭露头角,赴美深造比较文学的经历则进一步使其深谙东西方文学机制的运作逻辑。面对跨文化创作的挑战,他另辟蹊径,将个体文化认同的焦虑转化为跨文类书写的创造性动力,在中西文学传统的交汇处开辟出独特的表达空间。在广受西方读者欢迎的十部系列侦探小说中,他通

过语言形式的变异和文化内容的创造性转译,构建起独特的跨文化空间。中国古典思想资源被有机融入西方文类框架,类型边界的打破与文化意义的深度传递得以同步实现。传统文化观念在跨语境叙事中被重新激活,既规避了文化奇观化的陷阱,也避免了意义的过度稀释。此种策略不仅解构了“东方主义”话语对中国文化的刻板编码,更借助诗性语言与认知适配的转译方式,将中国传统思维转化为可被目标语读者感知的思想资源,最终促成文化符号的创造性再生与跨文化对话的真正实现。

相较之下,李翊云的语言实践呈现出深刻的内在张力,她将英语写作称为“背叛”与“自杀”(Li, 2017: 140),这种极端表述折射出深层的文化认同焦虑。从2005年首部小说《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到2025年出版的回忆录《自然万物只是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其创作始终以高度克制、近乎冷峻的英语风格,持续探索创伤叙述与身份表达的边界。这种疏离化的语言选择,既是对个体创伤的回应,也构成一种策略性书写。她规避情感渲染与猎奇化书写,以平实内敛的叙述聚焦普通华人及其移民后代的文化生活与心理境况,深入呈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与命运浮沉。在看似“去身份化”的语言表层下,她重构了真实而内在的中国经验,实现了对文化主体位置的重新锚定。其写作轨迹不仅映照出个体在跨文化语境中的精神跋涉,更彰显了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群体从语言焦虑走向主体性建构的范式转型。

综上,这些作家的语言实践共同构成了一种跨文化创作范式,他们不再被动适应英语的语言规约,而是主动运用语言形式变异与文化内容的多元翻译策略,在英语文本中开辟异质话语空间。这种语言实践既是文化记忆的存续机制,也是族裔身份的显性表征,他们的文学创作成为在跨语言张力中持续协商与重构身份的文化行动。“语言是存在之家”,它深刻塑造着人的感知方式与存在意识(Heidegger, 1998: 239-276)。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正通过这一系列策略性的语言实践,在英语世界中重建属于自身文化经验的存在根基。这一语言与身份的深层互动,也为进一步探讨其创作中族裔身份的建构机制提供了关键切入点。

三、语言策略与族裔身份重构机制

语言先于主体而存在,主体的建构过程本质上就是进入语言符号秩序的过程(Lacan, 2001: 23-86)。在跨文化语境下,华人新移民作家的英语创作构成了独特的族裔身份重构场域。作为习得语言的英语与承载文化根脉的中文,在其创作中交织碰撞,催生出别具一格的叙事形态,映现族裔身份重构的复杂性。那么,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形式成为族裔身份的显性表征,在西方语境中重塑了华人移民的文化符号?又有哪些语言策略方法成为他们重构身份的路径?笔者将从语言形式的变异与文化内容的翻译策略两个维度切入,系统考

察其身份建构的双重机制。

(一) 中式英语的语法越界与族裔身份表征

中式英语的语法越界是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在跨文化书写中发展出的语言策略。通过拼音转写和洋泾浜英语,他们使母语思维模式与文化记忆以形式化的方式得以具身呈现。这种“有意识的不规范”构成了一种抵抗性语言实践,既是对标准英语霸权的解构,也是族裔身份在语言形式层面的显性表征。

1. 拼音转写:语言符号的本土坚守与身份标识的强化

拼音的策略性运用是将汉语词汇以罗马字母直接转写并嵌入英语文本的语言实践,其本质是一种语言符号的本土坚守。通过非英语化的拼写形态高频出现,拼音构成对目标语言系统的“侵入”,制造出“文化陌生化”(Venuti, 2008)效果,迫使读者中断流畅阅读,在解码过程中直面汉语符号系统的独立存在。

高频出现的拼音已超越语音转写功能,转化为族裔身份的语言标识。它通过重复与认知冲击,在文本中构建起汉语语音体系的独立坐标,使作者的文化归属以最基础的语言单位得以固化。裘小龙对“天人合一”的双重编码(“tianren heyi”,辅以“heaven-and-human in one”)(Qiu, 2018: 135),既保留文化本真性,又搭建认知桥梁,在英语语境中创造出“第三空间”(Bhabha, 1994),使中国哲学概念以非归化方式参与身份建构。李翊云使用“zuanshi-wanglaowu”(Li, 2005: 111),则将中国社会特有的婚恋文化嵌入叙事,其拼音组合本身即成为文化差异的显性标记。拼音策略由此成为一种以语音为媒介的身份宣示,在语言表层实现对文化根脉的确认。

2. 洋泾浜英语:语言融合的特殊形态与文化记忆存续路径

作为汉英语言接触的典型产物,洋泾浜英语不仅折射出两种语言在类型学上的根本差异,更超越了第二语言习得中“过渡性变异”的传统定位,演变成为一种具有文化自觉性的语言实践。它是在跨文化语境中动态生成的混合形态,承载着移民群体的身份经验与文化记忆。这一语言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在语音层面,表现为汉语母语者对英语发音的系统性替代,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身份标记;在句法层面,则体现为汉语意合逻辑对英语形合结构的渗透,有意偏离主流英语规范。这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了洋泾浜英语作为文化表征与身份建构工具的核心机制。

(1) 语音变体:发音系统的融合与身份辨识度构建

汉语以“声调辨义”和“辅音韵尾简化”为特征,强调音节的独立性与语义的声调依赖;而英语则依赖多音节重音、辅音连缀与屈折变化,形成高度形式化的音系结构。这种跨语言的系统性差异,为语言迁移现象提供了深层动因。

在此背景下,华人移民在英语习得过程中普遍表现出母语语音系统的负迁移效应,将

汉语的发音规则无意识地投射至英语表达中,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语音重构现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θ]与[ð]向[s]与[z]的替代:由于汉语中缺乏咬舌音,学习者常以齿擦音代之,从而产生“sank”(thank)、“zat”(that)、“zer”(the)、“zey”(they)等典型变体。这一现象是两种语音系统在接触中基于可接受性与可操作性达成的动态平衡,体现了洋泾浜英语作为“语言融合特殊形态”的内在逻辑。

当此类语音变体进入文学场域,其意义即从语言学现象升华为文化实践。在哈金的小说《自由生活》(*A Free Life*)中,洋泾浜语音变体被系统性地运用,成为移民群体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作者通过精确的语音转写,将口语中的非标准发音转化为文本符号,使原本被视为非标准的语言变异成为人物身份的显性标记,使语言形态与文化背景深度绑定。这种语音符号化处理在叙事层面发挥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高度逼真的语言细节还原移民在跨文化语境中的生存实态,增强文本的现实质感与情感在场;另一方面,通过语音差异构建“文化他者”的边界,当主人公的洋泾浜英语与美国本土人物的标准发音形成对照时,语言差异即转化为对主流话语霸权的隐性抵抗,使边缘声音在文本中获得可见性。

(2) 句法异化:意合逻辑的文本化与主体性表达

从语言类型学视角看,英语作为印欧语系代表,具有鲜明的形合(hypotaxis)特征,依赖连词、关系代词等显性语法标记构建逻辑关联,句法结构严谨,动词通过时态、语态等屈折变化实现语法一致。相较之下,汉语作为汉藏语系语言,以意合(parataxis)为核心,强调语义的隐性连贯,依靠语序、语境与事理逻辑实现句法衔接,动词无形态变化,句式灵活,主题优先。

这一根本性差异在华人新移民作家的英语创作中转化为一种有意识的句法策略。哈金在《自由生活》(*A Free Life*)中的人物对话中高频使用短句、主动语态与省略结构,刻意规避英语典型的复合句与嵌套逻辑。例如:“We go to public bathhouse. I carry Taotao on my back and a big basin in front of me, got on bus to downtown. After we wash, I carry him and everything back... The bus too crowded and I can't find seat...”(Ha, 2007: 50)。这一语言风格在语法层面呈现出系统性偏离:时态缺失(“go”“carry”未用过去式)、主语省略(“got on bus”)、介词误用(“front of me”)、形容词谓语句违规(“The bus too crowded”)、冠词省略(“find seat”)等。通过保留汉语的意合逻辑与节奏特征,文本呈现出一种“去英语化”的句法结构。一方面,破碎化的短句再现了移民在跨文化表达中的语言焦虑与心理迟疑,使语言困境具象化;另一方面,这种句法异化构成对英语形合规范的有意偏离,使汉语的思维模式在英语文本中获得形式化呈现。语言由此不再是中立的交流工具,而成为文化认知的载体与身份认同的标识。

这种句法策略在美国华人新移民文学中已形成群体性创作特征。李翊云使用

“American good country”“a rocket scientist I am in China”(Li, 2005: 187)等非标准表达,制造语言陌生化效果;闵安琪在《红杜鹃》(*Red Azalea*)中通篇采用基础词汇与简单主谓宾结构,回避英语文学中常见的复杂句式、倒装与被动语态。这些创作选择共同构成对主流英语叙事逻辑的有意疏离。

由此,洋泾浜英语超越了传统定义中的语言过渡阶段,演化为承载文化记忆、表达生存困境与抵抗文化同化的复合型文学装置。从后殖民理论视角看,这种语言实践是对标准英语霸权的解构。正如 Spivak(2006)所指出,边缘群体的语言“越界”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抵抗——通过非规范的语言形态,拒绝被主流语言秩序完全吸纳。

以上中式英语的语法越界策略实则构成少数族裔作家在英语文学场域中彰显主体性的身份政治实践,佐证了语言作为移民群体协商文化认同、解构主流文化霸权的物质性媒介意义。拼音转写打破表音体系的霸权,语音变异暴露语言的权力关系,句法异化对主流文学叙事逻辑进行解构。这种抵抗性语言实践既非对源语的机械复刻,亦非对主流语法秩序的被动臣服,而是通过策略性的语法偏离,在目的语体系中凿刻出属于少数族裔的意义坐标,最终实现在跨文化语境中对自身主体性的鲜明表达。

(二)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与族裔身份的多重建构

与早期华人作家相比,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呈现出鲜明的“双语境”特征:其语言表达既根植于汉语的深层结构与文化语境,又处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转译限制与意义重构的张力之中。在这一跨文化场域中,他们不再将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视为语言障碍,而是将其转化为身份建构的主动策略。通过直译、通俗化转译与互文阐释等策略,不仅实现了中国文化符号的跨语境传递,而且在意义的协商与再创造中,推动了族裔身份的多重建构。

1. 直译:文化符号的直接呈现与根性身份的锚定

在跨文化写作场域中,新移民作家以直译策略为媒介,在语言层面构建“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的对话空间。这种策略并非简单的语义移植,而是通过保留中华文化符号的原初语义与形式特征,在英语文学体系中植入异质文化基因。相较于传统翻译理论强调的“忠实性”原则,新移民作家的直译实践更注重文化符号所承载的集体记忆与价值体系,使其成为维系身份认同、保留文化身份根基的重要载体。

哈金对“狐狸精”(fox spirit)(Ha, 1997:8)的直译摒弃了英语中可能消解文化特异性的意译路径,选择以“fox”保留其动物本源意象、以“spirit”标定其超自然属性的直译组合,将这一根植于中国文化语境的复合文化符号完整而未加稀释地植入英语文本。这一译法不仅实现了对“狐狸精”字面意义的忠实传递,更将其背后交织的民间精怪信仰、集体道德评判与性别权力结构等文化肌理一并带入目标语境。它打破英语读者既有的语言惯性,迫

使其悬置文化预设,进入一个需重新解读与协商的异质认知空间,从而得以切近中国社会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规范逻辑与生活经验。从这一意义上看,“fox spirit”不再是一个可被轻易归化的普通名词,而被重构为一个抵抗文化霸权的符号能指,在跨语际传播中持续激活其原生文化语境的意义网络。

类似的文化符号移植亦见于其他新移民作家的文本实践。裘小龙将“下海”译为“jump into the sea”(Qiu, 2018: 128),不仅保留了原词“投身商海”的隐喻结构,更借英语中“sea”所蕴含的广阔、未知与风险意涵,拓展了改革开放初期个体命运的历史象征维度。李翊云则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译为“for each drop of water one received, one has to repay with a well”(Li, 2005: 26),精准复现了原句“小恩大报”的意象对比逻辑。虽然“drop”与“well”并非完全对等,但在语境中有效传递了“水”的核心文化符号及其伦理象征,避免了抽象化归约为“favor”与“gratitude”的意义损耗,实现了形式直译与内涵保真的统一。闵安琪的实践同样具有代表性,她将“杀鸡儆猴”译为“killing a hen to shock the monkeys”(Min, 2013: 58),巧妙利用英语读者对动物寓言的认知图式,通过“hen-monkeys”这一超常规搭配制造语义张力,在概念整合中激活了独特的文化脚本,使集体惩戒的权力逻辑获得可感知的叙事载体。尤为典型的是,她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译为“swallow the bitterest in bitter; it makes one the finest in fine”(Min, 1994: 274)。这一译法刻意保留汉语排比结构与训诫语气,通过高度形式化的英语表达重构原句的修辞力量。它不仅传递了儒家伦理中“苦难成就卓越”的价值信念,更将汉语特有的“对仗—因果”思维模式物质化于英语文本之中,使“苦—人”的道德化逻辑超越谚语层面的语义转换,升华为一种携带文化认知基因的符号结构。这种直译迫使英语读者在陌生的句法节奏中重新感知东方价值的内在逻辑,实现哲学观念从认知体系向语言形式的创造性转化。

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以直译作为文化抵抗的核心语言策略,精准萃取源语文化基因,通过在跨语际语境中创造性转化,完成意义的再生产与重构。这一过程中,他们将汉语的思维范式深度植入英语表达体系,使源语文化符号得以直接呈现于目的语场域,不仅转化为英语语境中可识别、有张力的显性语法特征,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语言实践在异质文化土壤中锚定母语文化的根性身份,实现身份的自我赋权与文化边界的协商。

2. 通俗化转译:文化经验的传递与身份认同的唤起

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通过系统性的通俗化转译策略,将中国文化专有项解构为英语读者可感知的叙事元素,在消解文化认知壁垒的同时,实现跨文化身份认同的深层唤起。这种转译机制使抽象的文化经验转化为具身化的生活叙事,以亲和力的表达参与身份建构的动态过程。

在闵安琪的创作中,俗语的通俗化转译呈现为以自然逻辑解译人文隐喻的系统性转码

策略。以“老鼠儿子会打洞”(A rat naturally knows how to dig a hole.)(Min, 2010: 18)为例,通过生物学规律的通俗类比,将中国文化中家族习性传承的伦理观念,转译为跨文化语境下可通约的生活逻辑。这种转译将抽象的伦理范畴锚定在生物本能的具象叙事中,使文化他者得以通过日常经验理解东方家族观念。类似地,“树倒猢猻散”(Monkeys will scatter when the tree falls.)(ibid.: 67)的转译策略更具隐喻张力,作者以生态场景类比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将原文的隐喻转化为自然现象的通俗阐释。这种转码策略既延续其隐喻内核,又借助低语境文化中普适性的生态常识消解认知屏障,使抽象的人文隐喻获得可通约的具象化表达。在民歌转译层面,闵安琪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旋律创造性转写为“Jasmine flower, sweet jasmine flower”(Min, 2010: 23),以叠词韵律模拟原曲的抒情性,同时规避直译导致的语义损耗,使民歌成为友谊萌芽的情感隐喻符号。

这种转译实践的深层意义很明显。华裔作家通过通俗化转译完成了从文化他者到跨文化对话主体的身份转化。熟悉的文化符号以通俗化形式被重新编码,既缓解了文化失语的焦虑,又通过被理解的叙事效果强化了身份认同的自信。在此过程中,文化经验的传递不再是单向的他者展示,而成为身份认同在跨文化对话中被动态唤起的生成过程。

3. 互文阐释:文化关联的挖掘与身份内涵的丰富

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通过互文阐释策略,在英语写作中编织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的意义网络,形成独特的文本张力。这种策略通过文化符号的跨文本对话,深度挖掘文化关联,使华裔身份的内在多重文本参照中得以丰富。

古典互文与智慧重构在裘小龙《陈探长和我》(*Inspector Chen and Me*)中呈现为独特的叙事策略。他以宋真宗的名言“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There's a beauty walking out of books, and there's a gold chamber appearing in books.)(Qiu, 2018: 24)阐释人物价值观,借辛弃疾的“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When young, we knew nothing about worries, for the sake of a poem, we had a hard time mouthing worries.)(ibid.: 64)刻画主人公迷茫,使古典诗词成为推动侦探叙事的文本基因。这种创作不仅保留了中国文化的哲思精髓,更以英语表达逻辑重构了语义肌理,在“探案线索-古典引述”的互文结构中,古典诗词已不再是装饰性的文化标签,而转化为参与叙事逻辑建构的智慧主体,在侦探故事的悬念机制中实现文化身份的重构与言说。

在闵安琪《中国的珍珠》(*The Pearl of China*)中,互文阐释通过诗词文本的跨语际转译,构建起兼具文化辨识度与情感张力的审美场域。这种策略在读者文化认知框架与文学期待视野的张力中,实现了东方美学从历史符码到当代情感叙事的创造性转化。以赛珍珠吟诵《卜算子》的场景为例,译文“I live by the Yangtze River near its source, while you reside farthest down its course. You and I drink water out of the same stream, I haven't seen you

thought daily of you I dream.”(Min, 2010: 31)不仅保留了“长江头”与“长江尾”的地理意象,更通过“共饮长江水”的隐喻,将中国文化中“相思即共生”的生命哲学转化为跨文化可感的情感联结。这种互文通过水的意象挖掘出中西文化中的共性逻辑,使长江从地理符号升华为文化关联的隐喻载体。在处理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时,闵安琪将“孤帆远影碧空尽”译为“Her boat disappears where the waves meet the great river”(ibid.: 70),通过性别化改写(以“her”替代“his”)强化叙事的女性视角,暗合赛珍珠作为西方女性书写中国的主体定位,在“东方诗词”与“西方叙事”的互文中形成身份张力。当“相思”“送别”等传统母题被植入跨国叙事框架时,其文化内涵发生双重重构,一方面是对古典美学范式的现代性转译,另一方面则是对跨国身份的深层诠释。长江水在此构成互文阐释的核心,它既滋养了李白的盛唐诗意,也流淌在赛珍珠的民国记忆中,最终在跨语际书写中成为勾连历史与当下、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纽带,使身份内涵在文本对话中获得多重诠释可能。

上述针对中国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共同构建起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身份重构的多维体系。首先,直译策略以文化符号的本真性为基点,在跨文化书写中锚定身份坐标,守护文化基因的独特性。其次,通俗化转译以认知共鸣为桥梁,跨越文化认知的鸿沟,激活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情感共振,从而强化身份认同的情感纽带。最后,互文阐释则通过文本间的深层对话,挖掘文化关联,拓展身份内涵的丰富性。这三种策略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身份重构体系。

结语

异质文化碰撞下的语言困境如同双刃剑,既加剧了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的身份焦虑,也催生出其蓬勃的创作生命力。他们通过中式英语的语法越界与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在跨语境书写中既保留了母语思维的深层逻辑与文化意象的独特质感,又主动突破标准英语所代表的文化霸权秩序。在语言形式层面,中式英语语法越界体现为拼音转写、洋泾浜英语的语音变体与句法异化等策略,这些实践在族裔身份的标识、文化记忆的存续及主体性建构层面发挥关键作用;在文化内容层面,直译、通俗化转译与互文阐释等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在文化身份的锚定、认同唤起及内涵拓展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这些语言实践不仅实现了中华文化从“被表征对象”向“自我言说主体”的转变,更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身份重构提供了新的范式。语言不再是拘囿身份的容器,而是其不断流动与重塑的脚手架,支撑着主体在文化交叠处搭建流动的栖居之所,将文化对话从表层交融逐步推向深层互构,为世界文明图谱注入可持续的共生动力。

参考文献:

- Bhabha, H.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New York: Routledge.
- Brown, R. L. 1967. *Wilhelm Von Humboldt's Conception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Ha, J. 1997. *Under the Red Flag*[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Ha, J. 2007. *A Free Life*[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Ha, J. 2008. *The Writer as Migrant*[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idegger, M. 1998. Letter on Humanism[G]//W. McNeill. *Pathmarks*. Translated by F. A. Capuzz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9-276.
- Lacan, J. 2001. *Écrits: A Selection* [M]. Translated by A. Sheridan and M. Bowi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3-86.
- Li, Y. 2005. *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 Li, Y. 2017. *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 Min, A. 1994. *Red Azalea*[M]. New York: Anchor Books.
- Min, A. 2010. *Pearl of China*[M]. New York: Bloomsbury.
- Min, A. 2013. *The Cooked Seed: A Memoir*[M]. New York: Bloomsbury.
- Qiu, X. 2018. *Inspector Chen and Me: A Collection of Inspector Chen Stories*[M]. Middletown: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 Spivak, G. C. 2006.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M]. New York: Routledge.
- 哈金. 2008. 为外语腔调辩护[J]. 明迪译. 中国图书评论(9):108-114.
- 唐红英. 2025. 双语作家的译者行为研究——以袁小龙“作家-译者”双重身份互动关系为个案[J]. 外语导刊(3): 115-122.
- 唐蕾,俞洪亮. 2018. 文化无意识与身份建构——基于美籍华裔获得语作家的个案考察[J]. 外语研究(5):85-91.
- 唐书哲. 2018. 美国华人新移民英语文学中的中国叙事[J].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3):74-80.
- 卫景宜. 2014. 当代西方英语世界的中国留学生写作(1980-2010)[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余小梅. 2024. 华裔作家哈金、袁小龙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之抒情传统[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4):150-160.

Cross-Cultural Language Practices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by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ANG Lei

(Yangzhou University, Jiangsu Yangzhou 225000)

Abstract: The English writing of Chinese American new immigrant authors constitutes a deeply culturally conscious cross-linguistic practice, fundamentally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within a transnational context.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transcends the instrumental function of language, mark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passive survival adaptation to active, innovative self-fashioning, and elevating their writing from a mere tool for survival to a cultural weapon, representing a paradigmatic shift in linguistic purpose. At the level of linguistic form, these authors systematically enact grammatical transgression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pinyin* transliteration, phonetic variation and syntactic alienation in “pidgin” English. These practices not only reinforce the visibility and recognizability of ethnic identity, but also formalize the phonetic features and paratactic logic of Chinese within English texts, turning them into vital vehicle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At the level of cultural content, they employ divers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literal translation, vernacular adaptation, and intertextual elaboration, when rendering Chinese culture-specific items. These methods enable the direct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anchor a sense of rooted identity, evoke deep cultural recognition, and continuously enrich the dimensions of ethnic identity through the excav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 Collectively, this group's linguistic practice has surpassed simple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evolving into a culturally reconstructive paradigm marked by strategic intent, creative agency, and resistance. It serves not only as a form of cultural resistance but also as a vehicle for claiming discursive power, manifesting the authors' active agency in reshap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engaging with dominant narratives in the global age.

Key words: Chinese Americans; new immigrant authors; cross-cultural language practice;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冉诗洋